

我国拟对疫苗管理单独立法

疫苗管理法草案23日首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草案就疫苗管理单独立法,突出疫苗管理特点,强化疫苗的风险管理、全程控制、严格监管和社会共治,切实保证疫苗安全、有效和规范接种。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疫苗监管工作,要求加快完善疫苗药品监管长效机制。疫苗管理单独立法,有利于进一步提高疫苗管理措施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国家药监局政策法规司有关负责人介绍,2005年国务院出台了《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并于2016年进行了修订。此次提交审议的疫苗管理法草案,对疫苗研制、生产、流通、预防接种、补偿、赔偿等以法律形式进行明确规定,有利于建立系统的、全链条的疫苗管理制度。

这位负责人说,草案坚持疫苗的战略性和公益性,将预防重大疾病疫苗的研制、生产和储备纳入国家战略。如提出国家制定疫苗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鼓励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建立部门协调机制,统筹协调疫苗安全监管工作;进一步加强国家免疫规划制度,明确实行异常反应过错补偿机制。

为体现最严格监管,草案提出,国家对疫苗生产实行严于一般药品生产的准入制度。要求疫苗一般不得委托生产,要求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以及其他关键岗位人员具有良好信用记录,有相应的专业背景、从业经历。实行疫苗批签发制度、疫苗责任强制保险。此外,还规定疫苗的临床试验应当由三级医疗机构或者省级以上疾控机构实施或者组织实施。

对疫苗研制、生产、流通、预防接种全过程,草案有条款明确落实各方责任。国家实行疫苗全程信息化追溯制度,对上市疫苗开展质量跟踪分析;在流通环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组织将疫苗配送至接种单位,其他单位或个人不得向接种单位供应疫苗。

草案明晰监管责任,强化监管能力建设,严厉打击违法行为。要求药品监管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行疫苗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建设国家和省两级专业化、专业化检查员队伍;强化对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责任追究,体现疫苗违法行为从重处罚的原则。(新华社电)

外商投资法草案拟设立专章规定投资保护制度

23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的外商投资法草案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制定涉及外商投资的规范性文件,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违法减损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不得违法设置市场准入和退出条件、违法干预或者影响外商投资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外商投资法草案设立专章规定投资保护制度。草案规定,国家对外商投资不实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对外商投资实行征收的,应当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并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

我国高度关注知识产权保护,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知识产权。草案明确保护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鼓励基于自愿原则和商业规则开展技术合作。草案规定,外商投资过程中技术合作的条件由投资各方协商确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转让技术。

草案还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严格履行向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以及依法订立的各类合同。因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改变政策承诺或者合同约定的,应当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依法对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因此受到的损失予以补偿。

草案中的投资保护制度还包括建立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规定外商投资企业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通过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解决。(据新华社电)

农村“三块地”改革试点授权拟再次延期

为了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并做好试点工作与土地管理法修改工作的衔接,全国人大常委会23日审议关于再次延长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33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草案,拟将农村土地制度三项改革试点法律调整实施的期限再延长一年至2019年12月31日。

自然资源部部长陆昊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作说明时介绍,4年来,各试点地区在坚持“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不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大胆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利修法的制度创新成果。

但陆昊同时表示,农村土地制度三项改革试点工作在稳步有序推进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试点解决的问题,如试点推进不够平衡,平衡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收益的有效办法还不够多等。土地管理法修正案公布实施还需要一段时间,试点政策还要与法律修改稳妥衔接,有必要延长法律调整实施期限。(据新华社电)

财经要闻 Economy

商务部:继续推进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本报记者 程竹

商务部外贸司司长唐文弘23日撰文称,2018年,一系列外资促进政策举措落地实施,外商投资环境持续优化,有力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下一步,商务部将全面深入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继续推进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不断加大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力度,为外国投资者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唐文弘指出,2018年,商务部推进实施高水平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着力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取得积极成效。

一是以负面清单制度为核心推进投资自由。今年6月发布2018版全国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全国的负面清单限制措施缩减近1/4,在金融、交通、汽车、船舶制造

等22个领域放宽了外资准入限制,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在文化、资源、种业、电信等领域进一步扩大开放,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投资空间。

二是以放松管制为核心推进投资便利。报请国务院发布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持续推进外资领域“放管服”改革,将负面清单内投资总额10亿美元以下的外资审批权限下放至省级政府,在全国推行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商务备案与工商登记“一口办理”,推动投资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三是以法治建设为核心推进投资保护。商务部会同有关方面进一步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机制,开展外商投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加大对侵犯商业秘密、专利侵权假冒、网络盗版侵权等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完善外

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机制,推动各地区建立健全外资投诉机制,及时回应和解决外资企业合法诉求。

四是以优化服务为核心加强投资促进。不断优化外商投资促进服务政策体系,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农业、生态建设、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政策。完善投资促进工作体系,提升招商引资水平,引导各地政府转变观念,结合区域发展优势和特点,提高服务水平,有针对性地开展投资促进活动。

五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建设开放平台。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改革创新成效显著,继续推动30项改革试点经验向全国复制推广,带动全国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推动国务院出台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若干措施,赋予自

债券违约呈现四特点 专家建议完善处置机制

□本报记者 程竹 王姣

“债券违约并不可怕,关键在于违约后是否可以得到及时处置。”多位专家22日在“2018中国债券论坛”上表示,展望2019年,违约风险仍需警惕。为更好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我国应加强完善债券违约处置机制及相关法律框架,投资者也理性认识违约风险,客观对待违约现象。

债券违约呈四大特点

2018年以来,我国信用风险加速出清,新增违约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不完全统计,截至11月底,已经有36家新增违约企业,违约金额为628.2亿元。

中国债券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彭兴韵指出,今年债券违约变成一个普遍现象,并呈现四个特点:

第一,新增房地产行业违约、能源行业违约金额有所增加。综合违约数量和违约金额两种情形,从违约信用债所属行业来看,由工业、材料、信息技术、可选消费行业向其他行业蔓延,违约的行业种类越来越广泛。第二,民营企业的违约金额占比明显上升。第三,上市公司违约明显增加。第四,债券违约地区分布“无问西东”,

个税改革将全面落地 更多税收政策呼之欲出

(上接A01版)此外,相较此前的征求意见稿,暂行办法将直辖市等一档住房租金提升至每月1500元,其他人口超100万的城市提升至每月1100元。

“对纳税人来说,最大挑战可能在于准确理解和把握各项扣除的规定和要求,判断自身适用情况。从相关信息准备与提交和留存备查资料方面,应该说税务机关已尽可能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张志刚表示。

除直接减税外,长江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债券研究员赵伟介绍,包括降低居民消费品关税、消费税等间接减税措施,相当于提供商品价格补贴、增加居民实际购买力,对消费可形成提振作用。

更多优惠措施有望落地

10月,财政部部长刘昆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曾表示,财政部正在研究更大规模的减税、更加明显的降费措施。11月,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表示,中国正在研究推出新一轮更大规模、实质性、普惠性减税降费举措,包括推进增值税等实质性减税,对小微企业、科技型初创企业实施普惠性税收免除等。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社科院经济所所长高培勇认为,在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我国,相对而言最需要的是以降成本为主要目标、以企业为重点对象、以流转性税费为具体种类、以节用裕民为支撑财源和以制度变革为实施途径的实质性减税降费。

除减税外,降费措施也在酝酿中。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表示,现在,应继续考虑推出社保全社会统筹,这样基本养老的“蓄水池”就不再是好几十个,而是全社会统一成一个“蓄水池”,会大大提高资金互济功能,从而最大限度把社保中基本养老缴费标准降低。企业按更低标准缴费,就降低了负担。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许善达表示,为应对当下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建议继续推进增值税留抵退税,力争在5年内还清抵税款,最长不超过10年,以支持高科技、重资产企业发展。

减税效果加速体现

“在转型背景下,减税可兼顾稳增长和调结构功能,是积极财政重要发力点。”赵伟认为,其中,居民部门主要通过减税增加居民收入从而促进消费传导逻辑影响经济,企业部门主要通过减税增加企业盈利从而促进企业扩大资本开支的传导逻辑,对后续经济有所影响。

赵伟计算,2019年,减税对投资和消费增速具有提振作用,分别可提升增速1.9、0.8个百分点。具体而言,从居民部门看,综合个税起征点上调、专项附加扣除等影响,2019年全年减税规模或达4000亿元左右,通过提振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对2019年消费增速支持或在0.8个百分点左右。从企业部门看,2018年企业部门减负1.2万亿元左右,将对2019年企业资本开支行为产生影响;若减负部分全部体现为对资本开支的支持,对2019年投资增速的支持或在1.9个百分点左右。

各个地区都有发生。

“不断出现的信用债违约,所造成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员韩梦彬表示,首先,推迟或发行失败的信用债数量和规模逐年上升。截至11月底,我国今年推迟或发行失败信用债659只,占总发行数量的7.4%;推迟或发行失败信用债规模3978.48亿元,占总发行信用债规模的4.5%。

其次,对投资者而言,信用债违约会带来经济损失,降低其投资意愿;对企业而言,会抬升发债企业的融资成本,影响违约主体的经营活动;对债券市场而言,会增加信用风险,影响债券市场的融资功能。

信用风险不容忽视

专家表示,展望2019年,考虑到经济下行压力犹存、“宽信用”尚未显效、信用债到期量较大等因素,信用风险仍不容忽视。

目前,信用债违约事件频发主要归因于四个层面:一是全球经济环境低迷;二是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三是利率环境整体上升;四是债券到期偿债量大幅上升。

具体来看,韩梦彬认为,第一,2018年以来,美联储加息等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以及国内经济去杠杆、防控金融风险、货币流动性趋紧、非

标融资大幅下降、股权质押爆仓等国内经济金融环境,对债券市场的违约事件造成冲击。

第二,从行业层面看,产业不景气以及行业的周期性调整等因素导致了违约。如煤炭、钢铁、化工等强周期性行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

第三,从企业层面看,部分企业经营不善以及内部治理出现问题也会增加信用债违约的概率。比如经营不善、管理层动荡等问题。

“信用收缩会进入下半场,2018年信用市场风险偏好下降可能在2019年上半年延续。”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刚指出,2019年信用债到期量很大,同时上半年信用收缩还将持续,预计整个资金的供需缺口仍然会有所宽泛。考虑到2019年信用主体的偿债压力,还需要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支持。

“展望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下,信用违约频出,企业直接债券融资难度增大,发行量取决于支持民营企业相关政策落地情况。从需求端来看,投资者要持续关注防控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采取谨慎的投资策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资金部总经理刘优辉表示。

处置机制必须跟上

多位专家表示,债券违约并不可怕,关键在于违约后是否可以得到及时处置,违约主体是

经济后劲不足 美股阴云当头

(上接A01版)

流动性收紧压制美股

受美国启动30年来最大规模减税、放松监管等举措刺激,上半年美股延续2009年3月以来牛市,持续走强,三大股指迭创历史新高。但10月以来风云突变,美国三大股指纷纷抹去年内涨幅,转而下跌。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表示,减税对美股上市公司盈利刺激不可持续,投资者应准备好应对股市“糟糕时刻”。

摩根大通警告,流动性缺失已成美股大跌重要原因。此外,程序化、自动化交易日渐成为市场主流,导致市场发生“踩踏”“闪崩”风险大增。

美联储紧缩政策成为近期美股大跌直接

诸建芳:明年宏观政策突出“三点变化”

(上接A01版)

赤字率将大概率上升

中国证券报:明年财政政策将会如何选择?

诸建芳:财政政策可能将采取“赤字率调升+有力度减税”组合。首先,预计2019年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力度大于2018年。其次,地方政府融资会开“前门”、堵“后门”,广义狭义赤字率再次提升。一是融资来源比较确定,只能依靠发行国债和地方政府债;二是所有举债行为都纳入四本预算,都必须经人大审议和批准;三是融资规模一般情况下在年初已确定,不能随意更改和调整。2019年赤字率将大概率上升,狭义赤字率(一般预算)大概率回升至3%左右,广义赤字率上升幅度将大于狭义赤字率。第三,更有力度地减税。

除扩大财政赤字外,2019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另外一个体现是将加大减税政策实施力度。2019年,个人所得稅抵扣方案将实施,增值税有望三档合两档,增值税税率有望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税率还有下调空间,不排除在重点消费和投资领域还有进一步减税举措。

货币政策边际更趋“宽松”

中国证券报:明年货币政策将会如何选择?

诸建芳:2019年,货币政策将在边际上更“宽松”。从明年趋势看,降准还将进行2-3次,可能伴随小幅下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的预期,适度降低市场资金成本。

定向降准仍将持续,部分对冲外汇占款下降压力。2018年以来,央行降准降债,年内共进行四次降准,降低准备金率2.5个百分点。三季度以来,由于汇率持续承压,外汇占款已出现净流出趋势,明年资本外流压力可能会有所显

度以来新高,但在已发布四季度业绩前瞻的公司中,将近70%下调业绩预期。根据研究机构FactSet调查,2019年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业绩增速预期仅为9%。

与美股悲观预期相反,很多机构的共识是可“超配”美债,原因是经济下行叠加油价高位回落,2019年通缩风险大于通胀。一旦通胀数据回落,有望成为美债牛市主导因素。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建议,投资者可购买低风险流动资产,以抵御波动加剧和信贷息差扩大。

美元方面,受益于流动性收紧、避险需求提升及美联储可能再度加息,美元2019年有望进一步走强。高盛策略师强调,2019年主要投资类别收益都会下降,但在“波动性开始回升时,美元是回报最高也最坚挺的资产”。

“三点变化”

场操作工具上也有可能适当进行利率引导。

2019年,货币政策将重点解决货币传导机制不顺畅问题,预计对影子银行、表外融资做一定放松,部分监管规定将松绑。表内对表外的对冲将展开,表内融资规模比2018年将有所提升。

“稳增长”“扩内需”势在必行

中国证券报:展望2019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的不确定性是什么?如何应对?

诸建芳:2019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的不确定性仍是外部环境改变。从外部环境看,全球明年经济是同步放缓格局,尤其是美国经济在顶部状态,对外需环境有影响。第二个是流动性拐点,尤其是发达国家,明年流动性仍会持续收缩。这个影响美国长期的国债收益率,导致全球所有的资产价格根据这个变化作出一些调整。因此,我认为应对2019年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短期方案是“稳增长”和“扩内需”。2019年“稳增长”和“扩内需”势在必行。

具体来看,在宏观政策上,财政政策将更积极,广义赤字率有望回升,财政对基建支持力度加大,基建投资有望触底回升;减税政策有望进入“落实年”,企业增值税率归并,个人所得税抵扣有望实施。

在“三驾马车”方面,一是对“稳投资”,除“稳基建”外,宏观和行业政策可能将允许采矿业和制造业等周期行业产能扩张,从而支撑采矿业、制造业投资增速维持在高位甚至回升;二是对“稳消费”,除个人所得税改革外,不排除将出台一些消费刺激政策,主要体现在耐用消费品领域;三是对“稳外需”,出口退税、减税等政策有望进一步加大实施力度和范围。

在行业政策上,将进一步加大对对外开放力度,尤其是服务业。通过新一轮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来华投资。